

第一章

原始社会货币金融简史

第一节 原始社会的文明

中国原始社会产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众多文明，例如大汶口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红山文化等。在这些文明中，已经出现了私有财产，出现了交换，出现了货币的萌芽。

良渚文化出土了大量的玉器，这些玉器一般刻有人脸鸟爪、人脸兽身等造型。但也有些玉器上刻着圆。专家们推测这些玉器可能就是玉币（见《五万年中国简史》，文汇出版社 2020 年版）。巫师死后会把玉币戴在手腕上，因为玉币是用来礼天的东西，而天地中最大最重要的角色就是日月，尤其是太阳。在中国上古时代，掌握了时令变化规律的人，就掌握了权力，所以巫师成为最有权势的人。后来帝王的责任变成“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就将神权与君权合一了。古人重视祭祀，今人每逢清明、先人离世的重要日子进行祭奠（包括烧纸钱等）。如果按照今人给逝者烧纸钱的这种习惯推测，古人祭祀时也会给逝者供奉钱财。那么陪葬的贝壳、玉器、龟壳等，是否就是给逝者的钱财呢？

一、裴李岗文化

裴李岗文化距今约 7000~8000 年。裴李岗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发现，因为发掘遗址在河南新郑市裴李岗而得名（见图 1-1）。

该遗址出土了石制和陶制的各类生产生活用品，是新石器时代的代表。出土的磨制石器包括石镰、石铲、石斧、石磨盘等；陶器大多是红陶，说明烧制时的温度较低，包括三足钵和半月形双耳壶等（见图 1-2）。从出土文物来看，当时人类已经懂得畜牧和耕种，以农业为主，会饲养猪、狗等，并辅以渔猎采集。

裴李岗文化是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学家认为中国的农业革命最早在这里发生，裴李岗居民已进入锄耕农业阶段，处于以原始农业、手工业为主，以家庭饲养和渔猎业为辅的母系氏族社会。裴李岗文化时期人们已开始建造半地穴式房屋，并有公共墓地。



图 1-1 裴李岗文化遗址



图 1-2 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石器

二、双墩文化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安徽蚌埠市的双墩遗址（距今 7100~7300 年左右）为我们留下了 7000 年前原始社会的众多证据（见图 1-3）。考古队根据双墩遗址发现的石器、陶器、骨角器、蚌器、动物骨骼、稻壳遗迹等物品认定，“双墩人们的经济生活是以农业和渔猎为主，以采集和饲养猪为辅的多种经济生活形态”。这一认定对于我们了解 7000 年前的经济社会具有重要价值。



图 1-3 双墩文化遗址

双墩遗址出土了众多的陶器、石器、骨器及其残片，这些器皿或者残片上有刻画的符号以及圆孔（见图 1-4）。例如圆形中间带孔的石器、圆饼状石器以及纺轮形状的蚌器、带孔的刀形蚌器等。这些器具和残片证明了双墩文化时期的社会生活状况，从打猎用的工具、切削用的工具、种植用的农具，到餐饮用的器具等，不一而足。这说明当时的经济社会已经出现了分工协作，经济社会有了很好的发展。这种发展就有可能产生交换的需要，就可能出现私有财产和贸易，货币也就可能萌芽。



图 1-4 双墩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及其刻画符号

三、河姆渡文化

河姆渡文化距今约 5000~7000 年，持续时长大约 2000 年左右。河姆渡文化是分布在长江流域下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为首先在浙江省余姚县的河姆渡被发现而得名。河姆渡文化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宁波）绍（绍兴）平原，东达舟山群岛，分布区域以长江流域为主（见图 1-5）。



图 1-5 河姆渡文化遗址

河姆渡遗址出土陶器以夹炭黑陶为主，包括少量夹砂、泥质灰陶，器型包括釜、罐、杯、盘、钵、盆、缸、盂、灶、器盖等。也出土了一些彩绘陶，绘以咖啡色、黑褐色的变体植物纹（见图 1-6）。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石器较少，除了陶器之外，更多的是木器和骨器，例如木雕鱼、耕田用具耜和刀铲等切割器具，还有大量纺织工具。另外，在河姆渡遗址出土了我国最早的漆器。在食物方面，遗迹中有水稻的大量发现，经断定是人工栽培的水稻，这证明了水稻种植起源于中国。动物方面有野生的羊、鹿、猴子、虎、熊等，以及家养的猪、狗、水牛等家畜。



图 1-6 河姆渡文化遗址还原和出土的彩陶器

河姆渡文化为上古传说中“有巢氏”的存在提供了证据，遗址中发现大量干栏式建筑的遗迹。“有巢氏”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构木为巢的发明者，河姆渡文化也是有巢氏早期的文化。

四、红山文化

另一个比较重要的考古发现是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遗址（距今 5000~6000 年左右），红山文化发现了近千处遗址（见图 1-7）。专家考证认为，红山文化的社会形态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全盛时期，是以女性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该时期的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同时兼具牧业、渔业和狩猎。遗址内出土了大量的彩陶和玉器，尤其以玉器为著名，其中的玉龙是最为著名的玉器（见图 1-8）。红山玉龙被誉为“中华第一龙”，发现红山文化的赤峰市也因此被称为“中华玉龙之乡”。



图 1-7 红山文化遗址



图 1-8 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

由于红山文化分布面积广，在东北西部的热河地区，北起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南至河北北部，东达辽宁西部，西至辽河流域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大凌河上游。在遗址中发现，一般人的墓地多为积石冢，是规划的墓地，处于中心的大墓为最高规格（大量的玉器陪葬），而墓地越向边缘规格越低。大墓附近的墓葬有的也有玉器，但是数量和规格明显低于大墓，同时还葬有数量不等的猪、狗等。更低等级的墓葬只有陶器陪葬，个别的墓葬没有陪葬品。这说明红山文化的社会结构等级制度严格，已经出现了阶级分化，贫富差距很大，有了私有制的概念，甚至已经形成了原始的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玉器既是神权的象征，也可能是财富的象征，是货币的象征。

五、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距今约 5000~7000 年，持续时长约 2000 年左右。仰韶文化是我国重要的新

石器时代文化，因为发掘遗址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见图 1-9）。目前，全国有统计的仰韶文化遗址共 5013 处，东起豫东，西至甘肃、青海，北到河套内蒙古长城一线，南抵江汉，中心地区在豫西、晋南、陕东一带。分布在陕西、河南、山西、甘肃、河北、内蒙古、湖北、青海、宁夏等 9 个省区。其分布范围广、影响力非常大。

仰韶遗址出土的农耕石器包括石斧、石铲、磨盘等；出土的骨器包括骨制的鱼钩、鱼叉、箭头等；出土的陶器种类有钵、盆、碗、细颈壶、小口尖底瓶、罐与粗陶瓮等（见图 1-10）。尤其是彩陶器造型优美，表面用红彩或黑彩画出绚丽多彩的几何形图案和动物形花纹，其中人面形纹、鱼纹、鹿纹、蛙纹与鸟纹等形象逼真生动，代表仰韶时期人类文明和智慧达到了当时的鼎盛。

仰韶文化是中国黄河流域影响最大的一种原始文化，它纵横两千平方公里，绵延数千年。关于中国的传说时代，史书记载有炎帝、黄帝、颛顼、帝喾等部族，但由于疑古，中华文明史源头仍不清晰。随着仰韶文化遗址的多处发现，地下遗存验证了史书记载的正确性。汉族的前身“华夏族”，最早就发迹于黄河流域，而仰韶文化遗址中诸多考古发现，如陶器制造、纺织做衣、绘画雕塑、文字、历法、宫室营建等，同文献记载中炎帝黄帝时代的创造发明相吻合。



图 1-9 仰韶文化遗址



图 1-10 仰韶文化遗址还原和出土的彩陶器

第二节 原始社会货币的产生

要描述中国古代的货币金融发展状况，必须了解古代的社会概况。人类的起源多见于于

神话传说，后见于各种史记。综合古人的记载，主要观点是：盘古开天辟地之后，“三皇，即天皇、地皇、人皇（也称泰皇）”作为最高部落首领统治社会。关于“三皇”的传说众多，观点不一。一种观点是“三皇”指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其中燧人氏发明了火，伏羲氏发明了文字，神农氏开创了农业并遍尝百草治病救人。还有观点认为“三皇”是指伏羲、祝融、神农，或者指伏羲、神农、黄帝。

按照生产力的时代划分，古代社会包括：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之后进入机器生产时代，也就是现代社会时期。中国古代社会同样按照这个顺序演进发展。如果按照社会治理的角度划分，中国古代社会的演变顺序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

不论哪种观点，关于“三皇”均为口授相传，缺乏远古时期的文字记载。但是这个时期应该属于新石器时代和原始社会。“三皇”不应该是具体某个人或者神，而是某一类氏族部落的统称，是后人为了纪念前人的功绩而给予的尊称。

关于远古时期的社会发展状况，因为缺少必要的物证，只能从历史遗迹和文献记载中判断当时的情况。关于远古时期生产技术的进步首推燧人氏，他教会人们钻木取火，火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活和生产水平。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距今 500 万~1 万年）发现了石制品、用火遗迹、哺乳动物化石等。河北省保定市南庄头遗址出土了众多的动物遗骸、植物种子、石器、陶片，以及人类生活和生产的遗迹，也说明 1 万年前人类就掌握了火的使用。这说明燧人氏钻木取火的事情是真实存在的。

之后的伏羲氏教会了人们结网捕鱼、结绳记事，发明了文字，创造了八卦等，又进一步提高了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

后来神农氏教会部落的人们刀耕火种，发展农业，并遍尝百草，用中药治病。同时神农氏还组织人们“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见《易经·系辞下》）”，说明在神农氏时期，已经有了贸易和商品交换，这时候应该出现了早期的货币。同时《易经·系辞上》中提到“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贵与贱”虽然是作为人身份地位的用词，但是这些词语的产生也足以证明，《易经》成书的时代及其之前的时代已经有了衡量贵贱高低的计量办法或者物品，这都可以成为货币存在的证明。而神农氏的生存时代大约在公元前 3318 至公元前 3079 年，即距今 5000 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贸易和商品交换，必然就产生了一种等价物——货币。当时货币的形态是什么，目前还无法确认。

关于“五帝”的记载，比较一致。据《史记》记载，“五帝”是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他们是远古时期五个部落首领，因治理能力突出、对于后世的贡献巨大而被尊称为“五帝”。他们生活的时期大致是公元前 2700 年至前 2000 年左右这个时代，但是因为书中记载“五帝”的寿命均超过 100 岁，按照当下人的寿命分析，是值得怀疑的。要么是“五帝”的寿命有误，要么是古代与现代的时间长度不一致。

史书关于尧舜的传说非常多，其中尧舜禅让的故事成为历代帝王的典范。舜是远古时代的商人，他带领部落制盐贩盐、制作陶器。说明当时已经有了商品交易而且非常繁荣，甚至出现了贩盐制陶等专门的部落或者生产部门，说明出现了初级的专业化分工，交易应该形成了规模，这时的货币应该成为交易必不可少的媒介了。虽然没有考古证据来证明尧

舜时期的货币交换，但文献中已经记载当时出现了集市、贸易、买卖。按照正常推理，有交易就需要货币，而货币是什么形态，就不能按照现代人思维去考虑。

我们现在所熟悉的货币形态是电子货币、纸币以及金属货币，那么在远古时期货币的形态是什么呢？史书里面经常提到的是“贝币、刀币、布币”等。《史记·平准书》：“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说明龟、贝都曾经充当过交换的媒介。就目前发现的证据，“贝”作为货币是有事实依据的，在殷墟的“妇好”墓的陪葬物品中，发现了7000余枚贝币。而“龟”作为货币目前还没有看到文献记载，因为在远古时期，“龟”主要用于占卜和祭祀，没有说明是否用于交易。我们在这里或许可以猜测，“龟”可能在“贝”之前就作为货币，因为“龟”的用处非常重要，主要是占卜需要量比较大，而龟壳的产量又比较小，可能大多被消耗在占卜活动中，而留存下来的龟壳上面大多刻有占卜辞，是非常珍贵的物品，才有了“古者货贝而宝龟”的说法（见《说文解字》）。

与龟相同有可能充当货币的另一种物品是玉。由于玉具有便于分割、打磨、雕刻等特点，而且可以长期保存，因此，玉在几千年前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也是可能的。东北地区发现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就出土了成批的玉器，这些玉器呈现各种动物造型，以龙、蛇、鸟为主，其中也有玉龟壳的造型。这些玉质器物和其他陶器、石雕等反映了红山文化的社会生产、生活状态，作为陪葬品出现在不同规制的墓葬中，反映了当时已经出现的社会分级，玉器、陶器和其他石器代表了陪葬品的高低贵贱。如果据此判断，玉器、陶器和石器应该是代表了当时物品的价值高低，有可能充当一般等价物用作交换。

“龟贝珠玉”之所以作为货币存在，是因为交换的需要。而交换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出现了社会分工，有了私有财产，拥有不同私有财产的人为了满足不同的需要，“以己所有换己所无”。由于交换者的需求不同，例如：有粮的A需要羊，而有羊的B需要石器，有石器的C需要粮食，这样，三者可以选择粮食，或者石器，或者羊作为一种交换媒介，从而完成三者之间的交换并满足各自的需求。如果这种媒介不存在，则物与物的交换非常困难，从而约束甚至压制了人们的需求。因此，为了满足各自的需求，为了便于交换，有了对交换媒介的需求（即货币的雏形，古代曾经出现过用羊、石头、粮食作为媒介，近代二战的俘虏营中用烟作为交换媒介）。由于远古时期没有造纸技术和冶炼技术，所以无法制造现今的纸币或者金属货币，只能用日常生活常见、普遍需要、不易损坏的物品来充当一般等价物，例如动物及其皮毛、生产工具、战争武器等。

我国黄河上游的仰韶文化、齐家文化、马家窑文化等考古发现了距今5000多年的遗址，发现一夫一妻制和父权制已经建立，证明了那个时期已经产生了私有制和贫富分化的现象，男女已经在劳动领域进行了分工，男子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等，女子主要从事家务和纺织。1974年，在青海乐都柳湾发现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氏族公共墓地，包括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马厂类型和齐家文化的墓葬。墓葬中的随葬品有多有少，例如564墓的陶器品达到91件，反映当时家庭财产已经有了剩余，也意味着私有制的萌生。财产的占有欲导致商品交换的产生，必然会出现“粮羊石头”和“龟贝珠玉”之类的交换媒介。

生产规模的扩大、专业分工的细化、私有财产的占有，促进交换的进一步发展，个别商品就从商品中脱离出来，充当货币。齐家文化的部分墓葬中出土了海贝、仿海贝的石贝、

骨贝和蚌壳等，由于其普遍性存在，说明这些东西已经成为原始的货币了。由于齐家文化距今 5000 年左右，所以中国最早的货币应该产生于 5000 年前，而不是 3600 年至 3000 年前。

课后习题

一、即测即练

自
学
自
测



扫
描
此
码

二、思考题

1. 请查找古代金融尤其是远古金融发展的有关资料，分析中国古代货币产生的必要条件。
2. 根据我国重大的考古发现，请分析我国古代货币最早出现的历史时期。

参考文献

- [1] 默公. 说文解字教本[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9.
- [2]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蚌埠市博物馆. 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R].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
- [3] 威廉·戈兹曼. 千年金融史[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
- [4] 姚大力, 钱文忠, 等. 五万年中国简史[M].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20.
- [5]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5.
- [6] 任宪宝注译. 易经[M].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6.